俄国小说溯源

白文昌

(黑龙江大学, 哈尔滨 150080)

摘要:传统的观点认为,俄国的小说是18世纪下半期到19世纪初发展起来的,在18世纪中期以前俄国没有自己的小说;本文从现代学界对小说的认识入手,把“四分法”的小说概念引入对俄国文学发展史的研究,把俄国小说的源头上溯到17世纪末。

关键词:俄国小说; 分类法; 起源

中图分类号: I106.4

文献标识码: A

19世纪20—30年代,长期以来一直落后于欧洲的、不为世人所知的俄罗斯文学如沉睡了几百年的火山一般突然爆发,放射出灿烂夺目的光辉。俄罗斯大地深处蕴藏的数百年的文学能量骤然释放了出来——一时间俄罗斯文坛群英荟萃,异彩纷呈,令世界瞩目。俄罗斯文学从此与世界其他优秀民族的文学并驾齐驱,为世界人民奉献了百十部具有永恒意义的经典巨著,对人类文明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无论从作家队伍,还是从作品的数量来讲,俄罗斯文学在这一时期所取得的成就大都发生在小说领域,这是一个不争的历史事实。正如别林斯基所说:“今天,整个我们的文学都变成了长篇小说和中篇小说。……长篇小说打倒了一切,吞没了一切。……什么书最被人们爱读和争购?长篇小说和中篇小说。什么书使文学家在旦夕间致富,获得房屋和田产?长篇小说和中篇小说。……什么书记述着人类生活、道德规律和哲学体系,总而言之,所有一切学问?长篇小说和中篇小说。”(别林斯基 1996: 120)然而,在这个现象之外,我们注意到俄罗斯文学史中还有一个事实让人感到十分奇怪,那就是俄罗斯在19世纪以前没有一部像样的小说作品。关于这点他们自己也直言不讳。

“当时的文学主要是从法国文学翻译过来或者加以改作,至于取材于俄国生活的独特的创作,就差不多没有了。”(高尔基 1979: 5)俄国文学的这种状况使别林斯基发出感叹:“俄国文学不是土产的而是移植过来的植物。……我们的中篇小说开始得不久,真是不久,即从本世纪的20年代起。在这之前,它是由于奇想和时髦而从海洋彼方搬来、强制地移植在本国土壤上的异邦植物。玛尔林斯基君是……它的首创者。”(别林斯基 1996: 134)

如果说别林斯基把玛尔林斯基(Бестужев-Марлинский, 与普希金同时代的俄国作家,被称为散文中的普希金)称为俄国中篇小说的首创者,还不完全是从文学体裁发展的角度出发所作的严格的学术阐述,那么弗里德林德尔(Фридлендер 1962: 47)在其主编的《俄国长篇小说史》(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го романа)中说:“俄国文学中的长篇小说是在18世纪中期出现的……第一个长篇小说作家是艾明(Эмин 1735—1770)。”这是一个文学史家和文艺理论家在苏联科学院出版的权威著作中的论述,是严格从文学体裁发展的角度作出的学术定

论，他们认为在 18 世纪中期以前俄国没有小说。

那么实际情况是怎样的呢？

在溯源俄国小说之前，我们认为有必要先就“小说”的概念统一认识。因为对“小说”这个文学中的后起之秀，不同阶层、不同国家、不同时期人们的认识往往相差甚远。所以，我们必须对本论文所指的“小说”概念作出明确统一的界定。

“小说是一种文学体裁。通过一定的故事情节、典型环境的描写和人物形象的塑造来概括地反映社会生活，揭示社会本质。按其篇幅和内容的广狭，可分为长篇小说、中篇小说、短篇小说、小小说等”（董大年 1988：877）。小说的这一定义在我国已经取得比较一致的认可。例如在最通用的汉语工具书《新华字典》和《辞海》中，在文学专业工具书《文学词典》（湖北人民出版社，1983 年）中，在高等学校文科教材《文学原理新释》（顾祖钊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 年）等著作里都有相似的解释，差别仅在解释的详略而已。

可是当我们想用俄语来表达“小说”这一概念时，却遇到了困难：在俄语中找不到与汉语表达“小说”这一概念等值的、甚至是相近的词汇。中国的俄罗斯文学研究者在遇到这一问题时，常常采取回避或者含混的态度一带而过。只有上海外国语大学的许贤绪教授，在自己的专著《当代苏联小说史》（Обзорение современной советской беллетристики）（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1 年版）中，明确地使用了 беллетристика 这个词汇来表示“小说”这一概念，但没有解释自己的选词依据。查看《苏联大百科全书》（Вавилов С.И., Большая советск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1975 г.），我们知道 беллетристика 是个来源于法语的词汇，现已不大使用。从广义上讲它表示文学艺术，从狭义和经常使用的意义上讲，它表示区别于诗歌和戏剧的散文艺术（类似于俄语的 проза）。而 беллетрист 则表示创作短篇小说、中篇小说、长篇小说和其它文艺作品的作家，但不是诗人和戏剧作家，在这个意义上又类似于俄语的 романист 或 прозаик。由此看来 беллетристика 与汉语中的“小说”并不完全吻合。这是因为：1. 中国与俄国对文学作品类别进行区分的方法不同。俄国采用西方流行的三分法——根据反映社会生活时塑造艺术形象的不同方式和特点，把文学分为三大类，即：叙事文学（эпос）、抒情文学（лирика）和戏剧文学（драма）。而中国习惯采用四分法——根据作品的结构、体制和语言运用等特点，把文学分为诗歌、小说、散文、戏剧等四种体裁。2. 中国人按照“以对人物、情节和环境的具体描绘去反映社会生活”这一创作的根特征抽象出了“小说”这个较大的类别概念，而“根据作品篇幅长短、容量大小、情节繁简、人物多寡”又分出了长篇、中篇和短篇小说等几个从属的类别（大体裁“小说”之下的几个“子体裁”）。而在俄国，“长篇小说（роман）、中篇小说（повесть）和短篇小说（рассказ）同游记（путешествие）、政论（публицистика）等一样，都是从属于叙事文学这一范畴的几个平行的体裁”。（Волков 1994：130）

在研究小说时中国人求同存异，强调作品在结构、体裁和语言运用方面的相同之处，而把不同仅归于篇幅、容量、繁简等形式因素；俄国人正好与我们相反，他们从三分法的角度出发，强调的是长篇小说、中篇小说和短篇小说之间的不同。例如俄罗斯国家科学院院士利哈乔夫（Д.С. Лихачёв）在谈到这个问题时说：“……读长篇小说，读者主要（в большой мере）是在对小说主人公命运的思考中，自己作出结论；而读中篇小说，读者的思路大都（по преимуществу）由作者引导……所以，中篇小说往往（чаще）比长篇小说篇幅短、人物少、目的明，对人物命运的叙述较少、情节紧凑激烈”（Кузьмин 1984：3）。俄罗斯著名文艺理论家库兹明博士就此问题发表的论述是：“短篇小说一般（бычно）只讲一件事，这是它的中心，情节比较集中、紧凑，让人阅读和理解起来有一气呵成之感；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一般（обычно）围绕一个人讲述几件相关的事情。长篇小说一般（обычно）反映一个时代或人的一生，中篇小说却往往（чаще всего）局限于几件个别的、有时是非常重要的事件、情节，由它们

构成人物生活的某个时段；长篇小说描绘几个人的生活，而中篇小说常常(чаще всего)只描写一个人物以及他周围人物的生活；长篇小说中复杂而紧张的情节交织在一起，事件的展开气势磅礴、紧张激烈；而在中篇小说里，情节的发展往往(чаще всего)平淡、和缓；尽管不能根据作品的篇幅来划分它属于哪种体裁，但中篇小说的篇幅往往(чаще всего)比长篇小说短。篇幅决定着情节的安排和材料的使用，中篇小说的重心往往(чаще всего)不在情节的发展，而在对人物内心的刻画，对自然景物以及其它的描写”。(Кузьмин 1984: 5)

两位俄国学者在论述长篇、中篇和短篇小说的不同同时使用了大量感性的、模糊的、量化的概念，比如利哈乔夫使用了“大都”、“往往”、“较”等词语；而库兹明多次使用了“一般”、“往往”、“常常”等词语。这些词语本身表达的概念模棱两可，缺乏科学研究所需要的严格和清晰，不适合用于对学术概念的区分和界定。我们很难根据这些标准来判定某个作品是长篇还是中篇：1. 有些作品无论从篇幅、人物还是情节上看，本身的“体裁”特征十分模糊。比如普希金的名篇《上尉的女儿》，我们既可以把它看成是格里尼奥夫个人生活中的“几件个别的、……非常重要的事件、情节，由它们构成人物生活的时段”(中篇的特征)，也可以看成是“反映一个时代或人的一生(普加乔夫和他的时代)”的作品(长篇的特征)，作品的篇幅也很难说是大还是小。在确定莱蒙托夫的名著《当代英雄》的体裁时也会遇到相似的问题。2. 即便是考察那些在体裁归属问题上没有任何争议的作品，上面提到的那些标准也不具备多大的可操作性。例如我们为什么不能说《静静的顿河》不是围绕一个人物描写他生活的某个时段？因为整部作品的确是围绕哥萨克青年葛利高里展开，而其他人物都是主人公周围的人；况且作品也的确只写了葛利高里生活的一个(或者说几个)片段，因为当故事结束时，主人公还只不过是三十来岁的小伙子。与此相反，从拉斯普京(В. Г. Распутин)的中篇小说《活着，可要记住》里，我们倒是读到了安德列和纳斯焦娜可悲而短暂的一生……

所以我们说，俄国学界对于把长篇小说、中篇小说和短篇小说作为三种独立的文学体裁这种分法并不十分严格，值得商榷。对此，他们自己也有坦率的论述。库兹明博士就说过“文艺理论中对于把中篇小说作为一种体裁，对于它和长篇小说的区别没有明确的界定”。

(Кузьмин 1984: 6)特别是在历史上，“中篇小说(повесть)这一术语最初是用来指那些不刻意使用文学语言来增强表现力的散文(非韵文)作品，不管其内容属于哪种体裁……到了18世纪中期，当俄国作家接受了长篇小说(роман)这一术语以后，对散文作品体裁的划分混乱起来：篇幅相近的作品有不同的叫法。赫拉斯科夫(М. М. Херасков)把自己的《波利多尔》(Полидор)称为中篇小说(повесть)；艾明却把自己的《米拉蒙德奇遇记》(Непостоянная фортуна или Похождения Мирамонда)叫做长篇小说(роман)。卡拉姆津之后，中篇小说指的是篇幅较小的散文作品，而长篇小说——篇幅较大的散文作品。……19世纪40年代，出现了许多篇幅很小的散文作品，短篇小说也就在这一套概念中占有了自己的地位，逐渐成为固定的理论术语：短篇小说——小篇幅叙事散文；中篇小说——中等篇幅；长篇小说——大篇幅，一直沿用到今天。……显然，现在使用的这套术语需要重新考虑，进一步明确”。(Вавилов 1975: 368)俄国学界关于小说的这种认识与我们的观点何其相似！

以往，俄国学者一般都把长篇小说、中篇小说和短篇小说作为独立的文学体裁进行研究。比如《俄国长篇小说史》(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го романа, 1962)、库兹明的《现代俄国中篇小说》(Современная русская повесть, 1975)、辛年科(Синенко)的《当代中篇小说》(Современная повесть, 1971)和别林斯基的《论俄国的中篇小说和果戈理君的中篇小说》(О русской повести и повестях г.Гоголя, 1835)等等。这种研究自有其价值，不必赘言。但它没有把小说作为一个整体纳入其分析考察的视野，忽略了对小说这种文学体裁整体特征、演变过程、发展规律等许多层面的考察，难免失之偏颇。既然我们无法在长篇、中篇和短篇小说之间划出一条明确的、定性的分界线，那不妨换一个角度，就把它当作一个整体来考察，我们的研究也许会更全面、更客观一些，会看到一些处于俄国人视盲区的东西。所以本文将把一个相

对“中国式的”小说概念引入对俄国文学的研究中，来考察俄国小说是如何从萌芽走向成熟的。

俄国的书面文学起步较晚，直到 10—11 世纪之交才有了一个雏形，但到了 12 世纪末便一鸣惊人，产生了佚名的《伊戈尔远征记》(Слово о полку Игореве)。这部史诗无论就成书的时间，还是思想艺术价值来讲，都丝毫不逊色于同时代西欧其他几个民族的文学瑰宝。譬如德意志的《尼伯龙根之歌》、法兰西的《罗兰之歌》和西班牙的《熙德之歌》。但是俄罗斯的文学并没有像西欧其他民族那样得以持续发展。鞑靼—蒙古的野蛮入侵和两个半世纪的蹂躏中断并迟滞了俄罗斯文学的繁荣。如果说文艺复兴运动标志着欧洲诸国近代文学繁荣的开始。那么，俄国文学直到 17 世纪末才结束了中世纪时期。

17 世纪，俄国发生了许多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表明俄国的社会生活开始从中世纪向新时期过渡。首先是在人们的意识中，君权神授的观念开始动摇。自 1598 年留里克王室中断以后，皇位不断更迭，甚至三番五次出现自称为王者。“这种‘称王游戏’反映出人们思想意识中一个原则性的进步：人们不再相信一个国家只有一个沙皇，他体现着上帝的意志”。(Лихачёв 1980: 335) 1598—1613 年在俄国历史上被称为“混乱的时期”(смутное время)。这一时期，统治阶级忙于争夺王位的政治斗争，无暇顾及思想领域里出现的新情况，放松了对人民的精神控制，出现了一个无“书刊检查”的时代，作家的意志不受文学之外其它因素的影响，直接体现在他们的文学创作中。作家开始自由安排作品中人物的行动，摒弃中世纪传统的“要么是圣人，要么是罪人”的模式，从而发掘出人物性格中丰富、复杂、矛盾的特点。其次，社会矛盾不断激化：统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与奴役日益加剧，广大农民的反抗情绪更加激烈。17 世纪在俄国历史上又叫做暴乱的年代(бунташный век)，1606—1607 年爆发了俄国历史上第一次声势浩大的波洛特尼科夫(И.И.Болотников)农民起义；1649 年沙皇阿列克谢·罗曼诺夫颁布《法典》(Уложение)，农民被附着在地主的土地上，农奴制度在法律上完全形成；1667—1677 年爆发了更为壮阔的斯捷潘·拉辛(Степан Разин)领导的农民起义，农民首次作为重大的社会力量登上历史舞台。阶级斗争历来是影响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与这一时期的社会发展相适应，17 世纪的文化也一改中世纪特有的基督教文化一统天下的局面，具有很强的反叛意识。50 年代尼康(Никон)的宗教改革给俄国单调的社会文化生活以沉重的一击，其结果是正教罗斯分裂，大约 1/4 至 1/3 的人保持了旧的礼仪习惯。第三，在俄国的经济生活中手工业和商品生产显著增长，出现了标志着资本主义萌芽的工场手工业，商业活动密切了各地间的联系并逐渐形成了全俄统一的市场。第四，近代的民族国家逐渐形成。列宁说过“在中世纪的莫斯科皇朝时代，国家不是建立在民族的联合上，而是建立在地域的联合上，国家分成为一些领地或公国，仅仅在俄国历史的近代(大约自 17 世纪起)，这一切区域、领地和公国才真正在事实上融合成一个整体”。(曹靖华 1992: 18) 第五，由于民族国家的形成，文化迅速发展起来：在莫斯科开办了最初的学校，大量西方的世俗性文学作品被翻译介绍过来，俄罗斯文学中首次出现了经过加工的西方骑士小说，外国文学作品的译介也促进了俄国文学从内容到形式的更新。对传统的文学体裁重新思考促使一种全新的、结构复杂的作品出现，如带有浮士德式主题的《萨瓦·格鲁德岑的故事》(Повесть о Савве Грудцыне)。这一时期俄国出现了第一座剧院，文学方面也出现了许多新现象。

与俄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相适应，17 世纪的文学也处在一个过渡的阶段。它虽然还没有完全摆脱中世纪文学的束缚，但已经出现了一些新的倾向：

1. 在内容上出现了世俗化、个性化和民主化倾向。如这时期最富有时代生活气息之一的《弗罗尔·斯科别耶夫的故事》(Повесть о Фроле Скобееве)，讲述了诺夫哥罗德一个没落的贵族子弟弗罗尔的故事。弗罗尔平日靠替人写状子为生，生活贫困，所以一心向往发财致富，改变现状。当他听说邻近大贵族纳尔金·纳肖金家有个待字闺中的千金小姐时，就想

攀上这门亲事，捞一笔嫁妆。但是由于地位的卑微，弗罗尔无法通过正常途径达此目的，只好在大贵族家开晚会时，男扮女装接近小姐安奴希加，骗取并最终赢得了她的爱情。安奴希加的父亲知道此事后百般阻挠，但弗罗尔处变不惊，屡施巧计，几经周折，父亲不但容忍了女儿的婚事，而且赠以大笔财产与领地。弗罗尔和安奴希加过起了安逸的生活。这篇故事的主人公不是什么虔信、有德行的圣人，而是机智、甚至滑头和善于争取个人幸福的普通人（让读者不禁联想到司汤达的于连或普希金的格尔曼）。指导人物行为准则的不再是神的旨意和基督教的善恶观念，而是人对此世幸福的追求；个人从中世纪被视为群体一部分的观念中解放出来，小说中的人物也不再千人一面，而是表现出了自己的个性。文学第一次把人描写成矛盾复杂的社会产物，把人的性格看作是“善”和“恶”的特性的结合。所有这一切都体现了新时代对中世纪思想的反叛。

2. 这一时期还出现了一些带有鲜明民主色彩的讽刺作品，最有代表性的是：《谢米亚卡法庭的故事》（*Повесть о Щемякином суде*）。故事的上篇以滑稽喜剧的口吻讲述了一个穷苦农民在遭遇一系列不幸时所闯的“祸”；下篇讲述该农民被告上法庭后，如何机智地向法官谢米亚卡展示一块用布包着的石头，法官误以为这是向他行贿的暗示，做出有利于该农民的判决以及原告们为避免执行判决而向农民交付赎金的故事（有亚洲民间文学影响的痕迹）。另一篇有典型意义的作品是《棘鲈的故事》（*Повесть о Ерше Ершовиче*）。它以童话的形式，通过鱼类的拟人化行为，揭露了大贵族巧取豪夺农民土地而逍遥法外的社会现实。这类作品能够批判社会的贫富不均，揭露官场的腐败黑暗，嘲笑封建制度的“公正”。它们虽然无确切作者，但可想而知，是由小公务员、小市民等下层知识分子创作的。这表明社会中民主阶层力量的壮大和民众社会意识的觉醒。

3. 文学中出现了虚构的人物和情节。在诗体故事《戈列·兹洛恰斯基》（*Повесть о Горе-Злочасти*）中，故事的主人公没有名字，被称为年轻人，用以概括当时整个青年一代。“这是俄国古代文学中第一个虚构的概括形象”。（曹靖华 1992：21）这表明文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从一般实用的体裁（历史、布道、书信、传记等）中分离出来了。

4. 文学作品中出现了语言口语化和作品形式平民化的倾向。受译介的西欧骑士小说和冒险小说的影响，文学作品中虚构的、引人入胜的情节大大增加。文学的形式更加自由，内容更加适合消遣。这主要表现在这一时期十分流行的“故事”（*повесть*）这种文学形式中。在当时，“故事”指的是“不刻意追求强烈表现力的讲述或平实而扩展的叙述，它同另一种重要的体裁‘记’（*слово*）的区别是：‘故事’注重客观叙述，而‘记’注重抒发主观的情绪和感受”。（Кузьмин 1984：9—10）《萨瓦·格鲁德岑的故事》就是这样一部典型的作品。它写于17世纪60年代，讲述了俄国商人的儿子萨瓦·格鲁德岑为了享受尘世的欢娱而把灵魂出卖给魔鬼的故事：萨瓦被父亲派往外地处理商务，受到一名有夫之妇的诱惑。淫荡的女人先挑起他的激情，又抛弃了他。萨瓦痛苦万分，为了夺回她而不惜一切代价——甚至戕害灵魂。此念一闪，魔鬼便出现了。萨瓦背叛基督，同魔鬼签订了出卖灵魂的契约，女人回到了萨瓦的身边。后来萨瓦与魔鬼周游欧洲、参军，从莫斯科去了斯摩棱斯克。在魔鬼的帮助下，他连续战胜三个巨人，显示了出奇的勇敢，凯旋到莫斯科，成为英雄。但是，算总账的时候到了：萨瓦得了致命的病，才召来神甫做忏悔。这时，那恶魔现出“兽性”真形，折磨他，使萨瓦饱受非人之苦。他很后悔，祈求圣母保佑，圣母显灵，那张卖身契落到教堂的地面上，萨瓦从病榻上一跃而起，精神百倍。他康复后把财产分给穷人，自己削发出家。这个故事里的恶魔是萨瓦个人欲念的化身，恶魔出现之日，恰是萨瓦心生占人妻女邪念之时。故事情节已不再靠史事铺排，而是由主人公的个人品质、意志和欲念来推动。故事文体也有了变化，它初次尝试在广阔历史事件的背景上，在生活的现实环境里描写个人生活。故事时间的跨度很大，约占了17世纪最初的30年。此外故事还突破了爱情和情欲的描写禁区。这部作品虽然还没有完全摆脱宗教神学的说教，但有着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简单平实的叙述风

格，使用了较多的口语词汇。难怪尤里·洛特曼把这部作品称为“俄国的第一部长篇小说”。（Лотман 2001：30）

考察这些作品，我们看到“俄国的散文体系在17世纪经历了根本的转变和革新……出现了散文的小说化（беллетристизация прозы）”。（Лихачев 1980：173）那么17世纪出现的“故事”这种文学形式是否就是现代小说在俄国的最初萌芽？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有必要先弄清楚小说有哪些特征。

关于小说，佛斯特在其被誉为20世纪分析小说艺术的经典之作——《小说面面观》中采用了一个十分通俗简单的说法，即“小说是用散文写成的某种长度的故事”。（佛斯特 1981：3）佛斯特的观点得到了人们普遍的认同，比如马振方先生给小说下的定义——“小说是以散文体摹写虚拟人生的自足的文字语言艺术”。（马振方 1999：6）这就与佛斯特的说法十分接近！这个定义实际上包含了小说之成为小说的四个基本规定性，即叙事性、虚构性、散文性和文字自足性。17世纪出现在俄国的“故事”这种文学形式具有了比较简单的、容易为大众接受的叙述形式（即大部分故事用散文体写成，即使是用诗体写成，也十分通俗易懂）；有了虚构的人物、情节和反映现实生活的社会环境，人物表现出一定的个性，具有一定的概括性等特点，这就是小说这种体裁的基本要素。这些特点使人们有理由把《萨瓦·格鲁德岑的故事》称为“俄国长篇小说的萌芽”，（Фридлиндер 1962：39）虽然它是用诗歌体裁写成的。而曹靖华先生认为《谢米亚卡法庭的故事》和《棘鲈的故事》“可以说是后来现实主义小说的萌芽”（曹靖华 1992：23）。

据此，我们有理由认为：俄国小说在17世纪末已经开始萌芽。它的直接来源是中世纪的宗教故事，古代的民间创作，译介的西欧骑士小说和俄国现实社会中的新生事物。所以说俄国小说决非仅仅是18世纪从海外“移植过来的植物”，否则它在19世纪的繁荣景象倒真的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了。

参考文献

- [1]Вавилов 1975 Большая советск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Z]. М.
- [2]Волков 1995 Теория литературы[M]. М.
- [3]Кузьмин 1984 Повесть как жанр литературы[M]. М.
- [4]Кузьмин 1975 Современная русская повесть[M]. Ленинград.
- [5]Лихачёв 1980 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X – XII веков[M]. М.
- [6]Лотман 2001 Учебник по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е[M]. М.
- [7]Синекко 1971 Современная повесть[M]. М.
- [8]Фридлиндер 1962 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го романа[M]. Москва-Ленинград.
- [9]曹靖华 1992 俄苏文学史[M]，郑州：河南教育出版社。
- [10]董大年 1998 现代汉语分类辞典[M]，北京：汉语大词到出版社。
- [11]顾祖钊 2000 文学原理新释[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 [12]许贤绪 1991 当代苏联小说史[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 [13]别林斯基 1996 文学的幻想（满涛译）[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
- [14]高尔基 1979 俄国文学史（缪灵珠译）[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 [15]普希金 1983 普希金小说集（戴启篁译）[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

The Sonice of Russian Fictions

BAI Wen-chang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Harbin 150080,China)

Abstract: It is traditionally believed that Russian did not have novels of its own before the eighteenth century, and that Russian novels originated between the latter half of eighteenth century and the early nineteenth century. This paper applied the Chinese method “quartering” to the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Russian novel, and the result of our study is that the rise of Russian novel as a genre dates back to the end of seventeenth century.

Keywords: Russian novel; taxonomy; origination

收稿日期: 2006 - 03 - 15

基金项目: 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重大委托项目《二十世纪俄罗斯文学中的普希金传统》(项目批准号为: 04A009)。

作者简介: 白文昌(1968-), 男, 陕西延安人, 文学博士。黑龙江大学俄语学院副教授, 黑龙江大学俄语语言文学研究基地专职研究人员, 主要研究方向: 俄语语言学、俄罗斯文学。

[责任编辑: 刘 锐]